

中国羌族人口超常规增长的因素分析

张 朴

(四川省民族研究所, 四川 成都 610017)

摘 要: 根据全国五次人口普查数据和羌族聚居腹心区茂县的国民经济统计资料, 运用人口统计学方法, 用数据论证了社会变动是影响新中国成立后羌族人口持续高速增长的决定性因素, 自然增长则是次要因素, 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社会变动导致人口变化的案例, 有利于我们认识中国少数民族人口演变的一些特点。

关键词: 羌族人口; 超常规发展; 因素; 分析

中图分类号: C92-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 4149 (2008) 04- 0051- 05

Analysis of Factors Affecting Transnormal Growth of Qiang Nationality Population in China

ZHANG Pu

(The Ethnic Research Institute of Sichuan Province, Chengdu 610017,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of the data from China 5th Population Census and social-economic statistics in the area of Qiang nationality, the author discloses that it is the social change instead of the natural factor which truly brings about transnormal growth of Qiang nationality population, and this is an typical case of population change due to social change. The analysis will be helpful for understand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opulation evolution of minority nationalities in China.

Keywords: Qiang nationality population; transnormal growth; factors; analysis

全国五次人口普查表明, 少数民族人口增长快于汉族和全国人口增长速度。尤其是部分少数民族从建国初期到 2000 年, 其人口的增长一直保持比较高的速度, 这些民族持续出现的人口超常规增长, 引起人们的关注。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什么? 是单一因素还是多种因素? 对今后人口趋势又有何种影响? 本文根据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和有关部门的人口统计等资料, 分析新中国诞生以来羌族人口超常规增长

的原因, 以期对上述问题交出一份答卷。

一、羌族人口数量变动一般情况

羌族是我国人口数量较少的一个民族, 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统计共 30.61 万人, 在 56 个民族中居第 27 位。羌族人口 98.27% 集中分布在四川省, 只有 1.73% 的羌人聚居于贵州或散居于其他省区。在四川省内, 羌族人口又集中聚居在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境内沿岷江上

收稿日期: 2007- 05- 12
作者简介: 张朴 (1958-), 女, 四川成都人, 四川省民族研究所助研, 研究方向: 少数民族的婚姻、家庭和人口。

游的茂县、汶川、理县、黑水、松潘及绵阳市的北川、平武等连绵 7 个县的狭长区域，与汉、藏区相邻。少数羌民与汉、藏、回等族杂居。

据《四川通志》卷 65 载，羌族人口在清代中期（1812 年，嘉庆十七年）曾达到 26 万^[1]，但以后的百余年间急剧下降，至 20 世纪 50 年代初仅存 3 万人。140 余年间，下降约 86%，年递减 1.43%，已濒于灭亡边缘。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羌族人口趋势发生了重大转折，不但结束了锐减的局面，而且人口数量成倍增长，人口规模不断扩大，成为我国人口发展最快的少数民族之一。这一变化过程很有特色，颇具典型性。

1953 年全国第一次人口普查，羌族人口约 3.57 万人，到 2000 年第五次普查，已经达到 30.61 万人。47 年内净增 27.04 万人，增长 7.6 倍。不但快于汉族和全国人口增长的速度，也远远高过全国少数民族增长的速度。下面分时期考察羌族人口数量的变化（见表 1）。

1953~ 1964 年，是少数民族人口缓慢增长的阶段。羌族人口的增长率也相对较低，人口总量由 3.57 万人发展到 4.92 万人，11 年净增 1.35 万人，增长了 38%，年平均增长率 2.95%。净增人口占 1953~ 2000 年总增人口的

5%，是羌族人口增长幅度及规模较低的阶段。但年平均增长率高于全国少数民族 1.19% 的 1.76 个百分点（见表 2）。

1964~ 1978 年，全国少数民族跨入人口增长的高峰期，羌族人口规模及增长幅度也显著地高于前一阶段。人口总量达到 8.50 万人，14 年间净增 3.58 万人，增长 72.76%，年平均增长率 3.98%，较全国少数民族高出 1.55 个百分点。净增人数为 1953~ 2000 年羌族总增人数的 13%。

1978~ 1982 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民族政策得到全面恢复和落实，少数民族人口的增长上了一个新台阶，羌族人口达到 10.28 万人，4 年间净增 1.78 万人，增长 20.94%，和全国少数民族年平均增长 4.79% 较接近，净增人数占总增人口的 7%。

表 1 羌族人口数量与全国人口的比较 万人			
年份	全国	全国少数民族	羌族
1953	57786	3504	3.57
1964	69122	3990	4.92
1978	97523	5582	8.50
1982	100818	6730	10.28
1990	113368	9120	19.83
2000	126583	10643	30.61

资料来源: 1. 全国五次人口普查数据; 2. 1978 年为国家有关部门估算数.

表 2 羌族人口变动与全国人口的比较				
年份		全国	全国少数民族	羌族
1953~ 1964	增长人数 (万人)	11336	486	1.35
	年均增长人数 (万人)	1030	44	0.12
	年均增长率 (%)	1.64	1.19	2.95
1964~ 1978	增长人数 (万人)	28401	1592	3.58
	年均增长人数 (万人)	2029	114	0.26
	年均增长率 (%)	2.49	2.43	3.98
1978~ 1982	增长人数 (万人)	3295	1148	1.78
	年均增长人数 (万人)	824	287	0.45
	年均增长率 (%)	0.83	4.79	4.87
1982~ 1990	增长人数 (万人)	12550	2390	9.55
	年均增长人数 (万人)	1569	299	1.19
	年均增长率 (%)	1.48	3.87	8.56
1990~ 2000	增长人数 (万人)	13215	1523	10.78
	年均增长人数 (万人)	1322	152	1.08
	年均增长率 (%)	1.11	1.57	4.44
1953~ 2000	增长人数 (万人)	68797	7139	27.04
	年均增长人数 (万人)	1464	152	0.58
	年均增长率 (%)	1.68	2.39	4.68

资料来源: 同表 1.

1982~ 1990 年, 全国少数民族人口持续高速增长。羌族人口总量猛增至 19.83 万人, 8 年间净增 9.55 万人, 增长 92.90%。此时, 全国少数民族人口增长趋势减缓, 年平均增长率下降到 3.87%。但羌族人口年均增长率继续攀高到 8.56%, 比全国少数民族年均增长率高出 4.69 个百分点。净增人数占总增人口的 35%, 超过前 30 年净增人口的总和。

1990~ 2000 年, 羌族人口依然快速增长, 人口总量已突破 30 万人, 10 年内净增人口达到 10.78 万人, 增幅达到 54.36%。年平均增长率较前一阶段微降, 但仍达到 4.44%, 其增长速度在 56 个民族中仅次于高山族, 位居第二, 较全国少数民族年平均增长率高出 2.87 个百分点。净增人数占 47 年来总增人口的 40%, 是羌族人口增长最集中的阶段。

由此可见, 羌族人口不断地加速增长集中于 1978 年以后, 与全国少数民族人口趋势基本相同。羌族人口发展的特点, 在于各个时期其年平均增长率都高于全国少数民族。而且在 1982 年后全国少数民族人口年平均增长率连续下降的情况下, 羌族依然居高不下, 继续攀升。

二、羌族人口超常增长的原因分析

羌族人口是怎样增长起来的, 发展速度何以如此迅速? 众所周知, 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人口总量的变动受两大因素制约, 一是人口的自然变动, 一是人口的迁移变动。但研究一个民族, 就尚有由于民族的融合、同化和分化的演变过程, 所引起的各民族之间人口数量消长的因素。

就羌族而言, 无论哪一个时期, 人口的发展变化, 都受到人口自然变动和改变民族成分这两大因素的影响, 迁移变动的作用微小到可以不计。从 1953 年到 2000 年, 羌族净增的 27.04 万人中, 据估算, 自然增长约 7.55 万人, 占人口增加总量的 28%; 更改民族成分增加总数约 19.49 万人, 占人口增加总量的 72%。这些数字表明, 羌族总人口的变动在很

大程度上受更改民族成分的影响, 自然增长的作用则属于第二位 (见表 3)。

1. 社会变动是羌族人口高速增长的最重要因素

更改民族成分是民族演变过程中的现象, 古往今来历来都有。民族的融合和民族的自然同化, 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具有历史的进步作用。但由此引起的民族成分的变动是渐进的、长期的演变过程。相对较短的一定时期中, 民族成分以较快的速度、较大的规模发生变化, 则受统治阶级的民族政策所左右。民族压迫, 强制同化或民族平等, 共同繁荣, 决定着民族成分变化的取向, 会缩小或扩大某一些民族的人口数量。而民族成分较快、较大规模的变化, 正是近百年来羌族人口发展的一个典型特征。

新中国建立前, 历代统治者都推行“震慑番夷, 俾沐汉化”, “泯灭汉夷界限, 化一风同”, “强制其同化与统一”的政策。明、清两代曾多次用兵, 迫使诸羌“归附”、“岁贡粮蜡为编氓”^[2], “易姓更俗”, “示不复为羌也”。清自乾隆十七年 (1752 年) 至道光年间, 在羌区大规模实施“改土归流”, 将完成“改土归流”地区的羌民划入汉族。如“乾隆五十一年 (1786 年), 茂州营属桃花等十八寨编入汉户”^[3]。“乾隆五十三年 (1788 年), 大定千户属连环等寨编入汉户”^[4], “道光六年 (1826 年), 大、小姓, 大、小黑水及松坪五个土百户所辖五十八寨土地人民拨归附近之茂州管辖, 编入汉甲”^[5]。清中叶开始, 清政府更籍推行“里甲制”, “纳粮编里即为汉民”。如茂州所辖二十六里中, 原本仅两个汉民里, 清政府却将邻近汉区的陇东、蓬族、陇木、静州等七里均划为汉民里, 迫使所辖羌民更改为汉族^[6]。再如北川、平武二县, 史上曾经是白草番诸羌的聚居区域, 中央王朝强制推行“出汉冠冠诸羌”^①, 迫使白草诸羌改变自己的民族属性。到新中国成立时, 二县境内羌族不足 60 人。这类记载, 史籍上屡见不鲜。此外, 有部分羌民迫于民族歧视隐匿自己的民族成

① 邓存咏 (清). 龙安府志 (清道光) [Z]. 平武县人民政府重印, 1996. 182.

分; 还有部分羌民在与汉、藏民族的长期交往中, 吸收他民族的文化而改称汉族或者其他民族。这类事实, 史籍上亦不乏记载。导致羌族人口规模和分布区域不断缩小, 至 20 世纪 50 年代, 今茂县、松潘、汶川、理县的部分羌区和黑水、北川、平武等县的羌民, 大都改变为其他民族成分。1952 年, 西南民族大学赴羌区调查, 据自称“尔玛”(羌族自称) 和讲羌语估算的人口, 除北川和平武外, 尚有 6.5 万余人^①, 而 1953 年人口普查时, 四川羌族人口只有 3.57 万人, 只占 6.5 万人的 54%。其中分布于黑水的 2.36 万人, 在藏族的巨大影响下, 自愿改称藏族。可见大量羌族人口更改为其他民族成分, 是新中国建立前羌族人口锐减的一大原因, 也是新中国建立后大量羌族人口“还本归原”的历史根源。

更改民族成分, 首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 确立了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民族区域自治的政策, 促进了民族的觉醒。历史上被强迫同化、游离于民族母体的羌民, 纷纷要求“还本归原”。其后, 随着羌区各项事业的发展, 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党的民族政策得到全面恢复和落实, 起到了鼓励“还本归原”的作用, 成为引起羌族人口总量剧增的一个主要原因。

更改民族成分引起羌族人口数量变动的强度, 整个羌区缺乏这项统计, 但个别县有比较确切的登记。如北川县 1982 年“三普”到 1989 年 1 月, 为 4.29 万人恢复了羌族成分, 羌族人口总数由 1982 年的 0.20 万人增长 25.4 倍, 占总增人口的 84% 以上。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后, 平武县也有 3 万余人陆续恢复羌族成分。

自然变动和更改民族成分是制约羌族总人口变动的两大因素。为更好的观察两大因素在羌族人口发展中的作用, 我们根据人口统计学原理, 估算出自然增长和社会变动的人数。(见表 3) 这种估算虽有一定的局限, 但比较接近实际。

1953~ 1964 年, 更改民族成分增加的羌族人口为 0.52 万人, 占这一时期净增羌族人口的 39%, 年平均增长不到 400 人, 仅及年均自然增长人数的一半, 说明对人口总量变动的影响, 尚属于第二位因素。

1964~ 1978 年, 更改民族成分增加的羌族人口为 0.89 万人, 占这一时期净增羌族人口的 25%, 年平均增长 600 余人, 是年均自然增长人数的 33%, 上升较平缓, 比例较前时期还有所下降。对总人口变动的影响, 也属于次要因素。

1978~ 1982 年, 即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短短 4 年时间, 恢复为羌族的人口骤增至 0.94 万人, 占同期羌族净增人口的 53%, 年平均增长 0.23 万人, 超过前一时期年平均增长人数的 2.68 倍, 也超过了年均自然增长人数的 11%。上升为影响羌族人口数量变动的第一因素。

1982~ 1990 年, 更改民族成分的趋势进一步强化, 由此增加的羌族人口猛增至 7.56 万人, 占到这一时期总增羌族人口的 79%, 年平均增长 0.95 万人。为前一时期的 3 倍, 也高于年均自然增长人数 2.82 倍, 构成这一阶段羌族人口总量变动的决定性因素。

表 3 羌族人口数量变动因素构成

年份	中国羌族人口 (万人)	净增总人口 (万人)	自然变动		社会变动	
			总自然增长 人口(万人)	占同期净增 总数比重(%)	改变民族成分 增加人口(万人)	占同期净增 总数比重(%)
1953	3.57	—	—	—	—	—
1953~ 1964	4.92	1.3581	0.83	61.00	0.52	39.00
1964~ 1978	8.50	3.5759	2.69	75.00	0.89	25.00
1978~ 1982	10.28	1.7768	0.84	47.00	0.94	53.00
1982~ 1990	19.83	9.55	1.98	21.00	7.56	79.00
1990~ 2000	30.61	10.78	1.13	10.50	9.65	89.50
1953~ 2000	—	27.04	7.55	28.00	19.49	72.00

资料来源: 1. 《四川人口年鉴》(1950- 1987); 2 根据茂县《国民经济统计资料》和户籍管理部门提供资料计算。

① 西南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编印. 羌族调查资料(内部资料) [Z]. 1965. 3, 7- 18.

1990~2000年,更改民族成分的趋势延续,人数达到9.65万人,总增人口比前一时期高出10.5个百分点,为89.50%。也就是说,在新增加的人口中,有近九成是因民族成分改变所致。是导致这一时期羌族人口高速增长,不仅远远高于全国少数民族的平均增幅,而且在55个少数民族中仅次于高山族,位居第二。同样是构成这一时期羌族人口总量变动的决定性因素。

2. 高自然增长率是羌族人口高速增长的次要因素

高自然增长是羌族人口发展的又一个典型特征。随着羌区在各个不同时期社会经济形势的变化和人口政策的不同,人口的自然变动经历了一个由高峰到低谷、再到高峰和开始下降的过程。

1953~1964年,羌族年均出生率为30.21‰,年均死亡率12.4‰,年均自然增长率17.81‰,特别是头6年,年均自然增长率保持在21.65‰的高水平。形成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次人口增长高峰期,与汉族人口几乎是同步发展的,与其他少数民族此时尚处于缓慢增长的阶段有所不同。这主要由于新中国成立后,羌区社会空前安定,战祸兵燹消除,鸦片禁绝,疾病得到控制,羌民得以休养生息,人口负增长迅速扭转。11年内自然增长人数,估算达0.83万人,占这一阶段羌族人口增长总量的61%,约2/3的人来源于自然增长。自然增长在这一时期羌族人口总量变化中起着决定性作用。

1964~1978年,羌族人口的自然变动处于加速发展中,出现第二个增长高峰期。14年中,有10年的出生率均在40‰以上,最高年达到46.88‰,只有4年略低于40‰,年均出生率为41.16‰,年均自然增长率便高达28.59‰,十分惊人,年均自然增长人数约0.19万人,较前一阶段增长21‰。14年内自然增长人数共约2.69万人,占同期羌族人口增长总量的75%。有3/4的人来源于自然增长。自然增长仍是这一阶段羌族人口总量变动的决定性因素。

1978~1982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

国民族工作上出现了新的转机,对羌族人口增长产生了巨大影响。一方面,改正民族成分的深度和广度比以往任何时期都突出,另一方面羌区的计划生育工作较其他民族地区略早。前者使相当数量的人口“回归”,后者的干预则使羌族人口自然增长下降。这一时期年均自然增长率较前一阶段下降6个百分点。自然增长总人数占同期羌族人口增长总量的47%,未过半数。自然增长对羌族人口变动的影响,由过去的决定性作用,下降为第二位因素,这是一个重大的变化。

1982~1990年,计划生育促进人们的生育行为转变,人口的自然增长率明显下降,年均自然增长率控制在20‰以下,8年内自增人口共计1.98万人,仅为同期羌族人口增长总量的21%,说明净增人口中大部分来源于更改民族成分,自然增长的影响缩小。

1990~2000年,羌区的计划生育工作取得显著成效,计划生育和优生优育逐步为大部分群众所接受,自然增长率连续下降,并保持在较低的水平,最低年份已不到10‰。这一时期的年均自增率控制在12‰以内,自然增长的人口1.13万人,仅是社会变动增长人口的11.7%,占总净增人口的10%略强,较前一人人口时期减少近11个百分点。可以说,净增人口中绝大部分来源于更改民族成分,自然增长的影响已经减弱到历史的最低点。

三、结论

综上所述,羌族人口数量的变化,受到自然增长和社会变动两个基本因素的制约。

首先,在1978年以前,更改民族成分起着相当程度的影响,但自然变动是决定性的因素。在1978年以后,由于恢复和更改民族成分的规模和广度比以往更大更突出,人口自然变动的影响退居第二位,更改民族成分成为一定时期内羌族人口猛增的决定性因素。从47年整个过程看,更改民族成分增加的人口占到净增人口的72%以上,应该说是决定性的,自然增长的影响则居次要地位。

其次,更改民族成分是一定期限、一定地区民族之间人口的此消彼长,(下转第5页)

势上的变化,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发现,流动人口对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巨大,只是这种贡献的趋势是逐渐递减的。我们在对消除异方差后的模型进行估计后发现,人口流动对分地区的经济增长具有贡献效应,而进一步的研究发现,人口流动其实对我国的地区收敛影响很大,尽管影响程度和方向不同,但是它为我国地区差距和各地地区的地区差距扩大的趋势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解释。同时,通过本文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国家西部大开发政策实施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即吸引更多高层次人才参与西部建设将有力地促进西部的发展,同时缩小地区间经济增长的差距。

消除人口流动过程中的制度障碍、降低人口迁移的制度成本将极大地增强人口流动对地区经济增长收敛的贡献程度,当然,解决地区发展不平衡的最有效的方法肯定与完善政府职能、加强宏观调控有关,利用政策导向引导流动人口向“后发地区”流动,将逐渐消除地区差异。因此,尽管劳动力的流动对于减少城乡收入差距是至关重要的,但是由于中国的地区差距主要来自于城乡之间的差距,加快城市化是解决地区差距的最有效的办法。

参考文献:
[1] 蔡 , 都阳. 中国地区经济增长的趋同与差异——对西部开发战略的启示 [J]. 经济研究, 2000, (10).

[2] 沈坤荣, 马俊. 中国经济增长的“俱乐部收敛”特征及其成因研究 [J]. 经济研究, 2002, (1).
[3] T. Jian, J. Sachs, A. Wamer, Trends in Regional Inequality in China, NBER Working Paper 5412, 1996.
[4] 同 [1].
[5] 邓翔. 经济趋同理论与中国地区经济差距的实证研究 [M]. 成都: 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3.
[6] Barro, R. and X. Sala-i-Martin. Convergenc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2 (a), 100 (2): 223- 251.
[7] Barro, R. and X. Sala-i-Martin. Regional Growth and Migration: A Japan-United States Comparison, Journal of the Japanese and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6, 1992 (b): 312- 346.
[8] J. G. Williamson, Regional Inequality and the Process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A Description of the Pattern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1965, 13 (4): 45.
[9] 姚枝仲, 周素芳. 劳动力流动与地区差距 [J]. 世界经济, 2003, (4).
[10] Taylor, Alan M. and Jeffery G. Williamson. Convergence in the Age of Mass Migration. NBER Working Paper 4711, April 1994.
[11] 同 [9].
[12] 王德, 朱玮, 叶晖. 1985~ 2000 年我国人口迁移对区域经济差异的均衡作用研究 [J]. 人口与经济, 2003, (6).
[13] 林毅夫, 王格玮, 赵耀辉. 中国的地区不平等与劳动力转移. 蔡 . 中国转轨时期劳动力流动.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
[14] 段平忠, 刘传江. 人口流动对经济增长地区差距的影响 [J]. 中国软科学, 2005, (12).

[责任编辑 童玉芬]

(上接第 55 页)

对该地区的总人口不发生影响。随着一些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历史遗留问题的彻底解决,少数民族群众恢复本民族的愿望得到实现,今后成批的更改民族成分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因此,过去影响羌族人口超常规发展的决定因素将不断减弱,不复存在。自然增长才是羌族未来人口变动的最基本的因素。

第三,关于羌族未来人口的发展,从目前了解的情况看,其人口增长呈现良性发展态势。1990~ 2000 年,在羌族腹心地区年均自然增长率已控制在 12 %以内,此后的 5 年更降到历史最低水平,在 7 %上下波动。而在羌族聚居的边缘地区,自然增长率则更低。对平武

县羌族的调查反映出这 5 年中就有 3 年为负增长,人口发展已表现为向缩减型过渡。

与此同时,我们要清楚地认识到,羌族目前的低生育水平是计划生育的调控结果,尽管人们的观念有一定程度的改变,但传统观念在乡村的巨大影响依然存在。因此,计划生育工作依然任重道远,不得有丝毫松懈。

参考文献:
[1] 徐铭. 羌族人口的变化及其地理分布 [J]. 羌族研究, 1991, (1): 11- 12.
[2~ 6] 冉光荣, 李绍明, 周锡银. 羌族史 [M]. 成都: 四川民族出版社, 1985. 238- 254. 270.

[责任编辑 崔凤垣]